

孙犁评点黑板报

——重读孙犁系列随笔

侯军

个小小的黑板报!毛泽东同志说:知识分子到农村去,只要于人民有益,不惜从任何小事做起。如果抱着这么一种精神去从事一种工作,任何小小不引人注意的工作也会发挥实际有助于全面工作的力量。

因此,我们介绍这篇文章,就因为它是办黑板报的最好的经验介绍,它是一篇知识分子下乡工作的范例,它是一篇出色的文字。

作者葛洛同志就是第一期《卫生组长》的作者,因为他在桥镇乡的成绩,他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的文教英雄。

另一篇则是介绍了群众对黑板报的要求,以供参证。

在一期杂志中,专门辟出专栏来介绍黑板报,并且写了这么热情洋溢的推荐文字,可见孙犁对这种办报形式的重视和支持。他是把这家黑板报作为一个典型,把创办这家黑板报的葛洛同志,当做一个“知识分子深入基层,做好实际工作”的典型人物来推荐的。正如他在文章中引述毛泽东的一段话:“知识分子到农村去,只要于人民有益,不惜从任何小事做起。如果抱着这么一种精神去从事一种工作,任何小小不引人注意的工作也会发挥实际有助于全面工作的力量。”

孙犁之所以如此看重黑板报,是因为他本人也曾是黑板报的作者。对此,他不但从不因其卑微渺小而讳言,反而在文章中不无自豪地屡次提及——在《文字生涯》中,他写道:“油印也好,石印也好,破本草纸也好,黑板报土墙也好,都是我们发表

作品的场所。”(《晚华集》,第100页)在《题文集珍藏本》中,他写道:“我的作品,曾用白灰写在岩石上,用土纸抄写,贴在墙壁上,油印、石印和土法铅印,已经感到光荣和不易。”(《曲终集》第315页)在他看来,只要能被民众读到,作品的使命就算达成了。而对冀中村镇的父老乡亲而言,报纸、杂志、书籍等印刷品,时常还不及村头树荫下的那块黑板,更能入眼入心,更易于口口相传,流布民间——置身于当年的场域中,谁能轻视黑板报的重要性呢?

此外,孙犁还写过一篇《谈乡村文艺工作》的文章,其中特别批评了一些文化人瞧不起乡村人的倾向,他写道:“我们更不能说乡村人没文化,这些事,只是文化人们的事,这是不对的。真正懂艺术的还是老百姓。假如我们自己写出了东西,光叫文

化人看,只能从文法上文字上提些意见;如叫老百姓看,他能提出具体意见,哪不合适,哪不合他们的口味。应该多叫他们看,我们应确信老百姓会创造,会有好材料好作品,老百姓什么事还不会做呢?”(《孙犁文集·续编三》第480页)值得注意的是,这篇文章首发于1946年4月8日的《冀中导报》,后又被《平原杂志》第六期《文艺增刊》转发;而孙犁为黑板报写下的那段文字,则写于1946年8月25日。可见,这两篇文章差不多是同一时期成文的。这反映出孙犁在彼时彼刻,对普及乡村文化是何等重视,对普通民众的阅读生活是何等关心。他是真正身体力行、想方设法地为农民大众送去精神食粮的,这就像他为《平原杂志》所写的一则启事中所说的:“本杂志为为人民服务”——他是说到做到了!

一个报人,不能只是眼睛向上,紧盯着庙堂;更要俯身向下,把目光投向苍生——这,无疑是孙犁先生为办黑板报而热情鼓舞所带给我们的一点启示。

(2022年12月25-27日,于深圳寄茶斋)



胡西淳

欢欣开悟

拙墨短筒

晚岁说起悲愧悔,顿时化为清江水。

橡筋动力玩具

伍柳

小时候,我喜欢玩具汽车、飞机、轮船之类的海陆空“交通工具”,但那大多属于摆件,只有观赏的价值,要想玩,也只是端在手中,口中念念有词地模仿各种声响,然后随着手势进行摆动。

随着慢慢长大,这种玩法颇不过瘾,因为它们毕竟不能像真实的交通工具那样动起来,不能运动,那还能叫“交通工具”吗?于是,我就想尝试着自己做有动力的交通玩具。那时,我还不懂电动机的原理,更没有现在遥控的概念,但我想到了一种原始的动力,那就是橡筋。

这个想法源自我的一个邻居大哥。他家里有一辆用缝纫机上的线轴做成的小车,能在桌上、地上慢慢行走,木轮因为刻成锯齿状,所以遇到坡道或障碍物,还能慢慢爬上爬下。这辆小车引起了我的兴趣。那个大哥见了,就故作神秘地对我说,里面有个小人开车。但他骗不了我,我看出来了,小车的动力就来自一根橡筋。于是,回家我也找出线轴、橡筋等零件,自己装配了一辆小车,也把木轮刻成锯齿状,给小车上满弦再放下,看到我的小车也能慢慢地行走起来,也能爬坡过坎,真是喜不自禁。

接着,我又把这个原理用到自制的船模上,用橡筋作为螺旋桨的动力,上满弦后把船放进水中,随着螺旋桨的旋转,船模就起航了。再后来,我在飞机模型上也装上橡筋,上满弦后放飞,飞机模型便在空中翱翔起来。

如今,橡筋动力模型已经很少见到了,我在小区常见孩子们在玩遥控飞机。高新技术让记忆中的橡筋飞机相形见绌,但我对儿时的橡筋玩具还是有一种难舍的情结。

有一次,在航空博物馆参观时,意外地发现还有人售卖橡筋动力飞机模型。一时兴奋便买了一架,到家就装配起来,那满满的回忆,一时又溢上心头。



晚清官场,曾国藩是且避之唯恐不及。曾国藩在《治兵语录》中说:驭将之道,最贵推诚,不贵权术。他还说:用人之道,最忌权术。曾国藩的部属、湘军大将李瀚章曾经这样描述他的长官:“一片真诚,从来不跟下属玩弄权术,所以人人都乐意为他所用。”

此外,从而立之年开始,曾国藩便学做“圣人”,修身养性。他曾自订自我管理的十二条军规,诸如:黎明即起,读书不二,作字习文,谨言慎行,节欲保身,夜不出门,等等,长期坚持不辍。

对己严格要求,待人至真至诚,让曾国藩得道多助,朋友云集,不仅打造了一支能征善战的无敌湘军,更让他仕途坦荡,平步青云。

曾国藩的人生命运和肺腑之论启示我们:权术、权谋是旁门左道,纵然可得逞于一时,却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。所谓权术,不过是既不信任他人,也不自信的表现,是目的至上、自私自利的产物,是虚伪、狡诈、阴谋、背叛的代名词。

鲁迅先生说:“捣鬼有术,也有效,然而有限,所以以此成大事者,古来无有。”堪称至理名言,值得铭记!

「不会做官」的曾国藩

张朝鸿

梁启超在饮冰室

甄明

今年是梁启超纪念馆建馆20周年。记得位于河北区民族路的饮冰室于2001年修复。紧接着,《今晚报》发起了《梁启超与饮冰室》征文,其中涉及饮冰室的内容较少。实际上,在早年梁启超门生故旧的回忆中有涉及饮冰室内容,笔者通过浏览整理,撮集系列文章。

在梁启超门生的回忆中,杨鸿烈《回忆梁启超先生》一文,对饮冰室的描述较为详细。杨鸿烈早年为梁启超的私淑子弟,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。毕业后,被梁启超推荐到南开大学教书,从而有闲暇“即到梁氏住宅请益,并借阅读书,因而获知梁氏生平某些片断事迹”。

杨氏回忆“梁氏在天津河东旧意租界玛尔谷路(马可波罗路)有两幢花园洋房,其中一幢为居家眷所用的大厦,大厦二楼有一个大房间,即为人所周知的‘饮冰室’,系梁氏经常写稿的研究室。另一幢大厦则为以蔚蓝色琉璃瓦为天顶的欧式三层楼”。从这段话,可以看出杨鸿烈定义著述写稿的“饮冰室”不在藏书楼,而在故居的二楼。

饮冰室的藏书并非秘而不示,“不像唐朝李泌的父亲诫子孙不许将藏书出门”,特许学生们自由阅览,即便是珍本、孤本也照样借出。

梁启超的藏书最初由大女儿梁令嫻管理,早年著述所需资料,多经她代为搜

集。后来由族侄梁廷灿管理,身上经常挂着一大串橱柜钥匙。每当梁启超撰写文稿,需要查书的时候,梁廷灿“有求必应”“历历不爽”。时间一长,梁廷灿成为一名目录专家,并有“活目录”的雅号。梁令嫻与梁廷灿对资料的熟悉,无疑给予梁启超的著述极大的帮助,“如《欧洲战役史论》,在十天之内即脱稿成书,其原因即在于此”。

除了读书,梁启超在饮冰室还有一些室内活动,如喜欢打麻将。有人问杨鸿烈“是不是你天天都要到此请梁先生讲书?”梁启超听见,便莞尔一笑,说:“非也!是我和几个朋友,搓搓小麻将,作方城之戏。”梁启超喜欢书法,“不论在天津、北京和西郊清华园的书房里,随处都悬挂着一些长长短短、大大小小,羊兔狼毛所制的毛笔,而且都有一张

既长且大的签押桌横放在中间”。桌子上还放置雪茄烟的盘子,这是梁启超“作文构思时的刺激物”。梁启超对“管、毫、墨、纸,处处考究”。每天侍役必定要磨墨,隔一晚的墨汁,倒去不用,劣纸也一概拒绝使用,而且所写的字“多数都是些不大不小的中楷行书”。

梁启超还喜欢收藏故物,书桌上摆着一个既大且长的酸枝木匣子,里面装着明末清初汉学家顾亭林的手卷。此外,梁启超还把从埃及的金字塔和欧洲意大利庞贝古城所得的砖石,放在外客厅里特制的玻璃匣内,并亲笔加以说明解释。

杨鸿烈的回忆十分细微,还原了梁启超在饮冰室的真实生活。

星期文库

饮冰室的故事之一